

HANYU LICI YANJIU

汉语詈词研究

——汉语骂詈小史

刘福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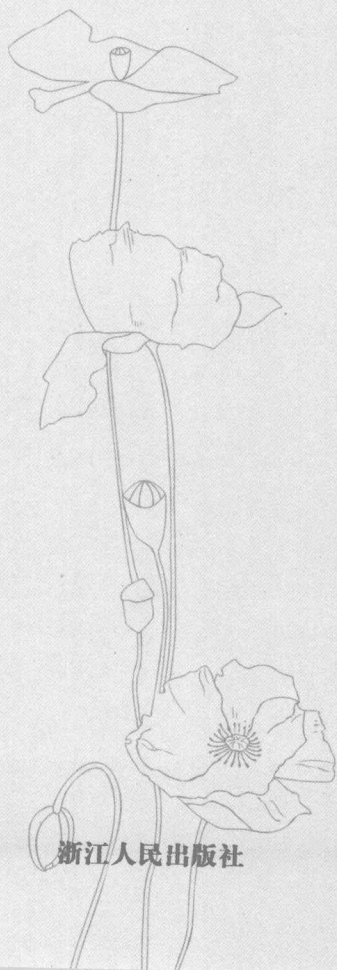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汉语詈词研究

——汉语骂詈小史

刘福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詈词研究/刘福根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213-03686-6

I. 汉… II. 刘… III. 汉语-词语-研究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086 号

书 名

汉语詈词研究

作 者

刘福根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何 方

责任校对

张谷年

封面设计

赵 雅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686-6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引言

一、骂詈与詈词

骂詈是历史十分悠久的言语行为。“骂”“詈”二字出现很早,《说文解字》均有收录。《说文·网部》:“詈,罵也,从网从言,网辜人。”“罵,詈也,从网馬声。”可见骂、詈二字互训。关于“骂”的字形,《正字通·马部》:“骂,按六书本作罵,通作骂,骂亦俗省。”先秦文献中,“骂”“詈”二字出现频率尚不高。《十三经》中,“骂”字仅一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冉竖射陈武子,中手,(武子)失弓而骂。”“詈”字四见,《尚书·无逸》:“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人乃或诳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诗·大雅·桑柔》:“谅曰不可,覆背善詈。”《礼记·曲礼上》:“父母有疾……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秦汉以后文献“骂”“詈”始多见,仅《史记》一书,“骂”字四十四见,“詈”字二见。

何为骂詈?《说文》释“詈”为网罪人,可见詈之本义当是“编织恶言以加罪于人”,骂詈原有怪罪、斥责之用。至[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六引《考声》云:“骂,以恶言相詈辱也。”“恶言相加”是形式,“辱人”是目的。从汉至唐,骂詈的“恶言相加”未变,但重心由斥责转移到了侮辱。通观二十五史的众多例子^①,骂詈从形式上看大多数是恶言相加的,目的亦大致不出斥责或侮辱。这一情况到现代汉语中仍是如此,《现代汉语词典》中“骂”有两个义项:(1)用粗野或恶意的话侮辱人;(2)斥责(释“詈”为“骂”的书面语)。可见从古至今骂詈有

^① 二十五史正文中“骂”字出现 1183 次,“詈”字出现 316 次。据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二十五史检索统计。

两个落脚点:恶言相加;斥责侮辱。当然,从古今骂詈实践看,除了斥责与侮辱,骂詈往往掺杂了愤怒、仇恨、憎恶、威胁等多种情绪或情感。另外,笑骂中所表达出来的谐谑、调侃乃至友好等是骂詈的活用,并非骂詈的本义。

骂詈的构成有两个基本要素:骂意和骂语。骂意即体现骂詈者的情绪和情感,骂语是用于骂詈的语言材料。(江结宝,2000)骂詈的构成类型一般认为有三种:有詈词而且有骂意;有詈词却无骂意;无詈词却有骂意。(周文,2002)值得说明的是,无詈词却有骂意的言语现象,应该算作讽刺、挖苦、反语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骂詈。

“詈词”这一概念,术语向来不大统一。我们对《汉语大词典》作全程检索,共查到“詈词”、“詈语”、“詈人之词”、“詈辞”、“詈称”、“骂人语”、“骂人话”、“骂人的话”、“骂人之词”、“骂人之语”、“骂人的粗话”、“辱骂之词”、“责骂的话”等13种名称,内涵与外延均基本相同。(刘福根,1992)鉴于骂詈的语言材料既有词,又有词组、短语、俗语等,没有一个准确的术语来统一表示,本书暂且使用“詈词”这一相对不够精确的术语。詈词是经常性地用于骂詈的词、短语或俗语,其范围比笼统的说法“粗野或恶意的话”要小。具体语境中出现的临时性表示恶意的词语不应该看做詈词,经常性地用作骂詈的才能称为詈词。

与詈词相关的一些类似的概念也需要略加辨别。一是恶言恶语,指带有恶意的言语,所指宽泛,难以界定其范围。二是粗话,指粗俗、粗鲁的话,与说话者的修养有关。三是脏话,肮脏下流的话,往往与排泄、性有关。四是淫秽之语,与性相关的脏话。以上几种可用作詈词,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詈词。

汉语中与“詈词”相近的词语很丰富,需要特别加以区别的是咒语。诅咒与骂詈一样,历史悠久,但是“咒”字出现较晚。“呪”是“咒”的异体,古籍多作“呪”,二字比较后起,《说文解字》均未收,汉以后文献始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后元二年,侯终根坐咒诅诛,国除。”《后汉书·凉辅传》:“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辅今敢自祈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这里的“咒”和“呪”,意思都不是现代汉语中“咒”的一般意义“说希望人不顺利的话”(《现代汉语词典》),而是相当于先秦文献中频见的“祝”。《尚书·无逸》“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孔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明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咒(呪)”起初承担了“祝”的部分义项,后来又指僧、道、方士等号称用于驱鬼降魔的口诀,另外梵语陀罗尼义译为呪或曰真言。可见咒语从历史上看始终与詈词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许多詈词带有诅咒的意味。

“祝”也是我国古代一种传统的祭祀礼仪。“诅”是“祝”的一种。诅即诅

咒,《说文》:“诅,誅也。”《尚书·无逸》:“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诗经·大雅·荡》亦云:“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毛传》曰:“作,祝,诅也。”《周礼·春官·诅祝》贾公彦疏解释“诅”曰:“诅,谓祝之使沮败也。”如此则善祝曰祝,恶祝曰诅。诅就是一种在神前祈祷,要神惩罚邪恶,使之沮败的祭祀礼仪。诅亦有“诅辞”,《周礼·春官·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讼、檄、祭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而这些诅辞,惜今多已不传,我们只能从仅存的《诅楚文》中了解它的一些特点。今传世之《诅楚文》即是战国时秦人在神前诅楚,祈求神助其“克荆楚师”的“诅辞”。“诅辞”当指出被诅者所做恶事以动神,使其作为应受惩罚的依据。

还需区别的是禁忌语。禁忌语英文为 taboo,源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本义为“神圣不可接触的”,引申为“需极度注意的、禁止的”。禁忌指社会力图避免的事物和行为,如死亡、疾病、性、灾祸等,并进而包括指称这些事物和行为的语言。禁忌在世界各文化中,不管是高度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还是原始状态的野蛮部落均普遍存在。禁忌语的极端表现是语言拜物教,亦称语言灵物崇拜,语言被等同于其所指的事物而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力量。可见禁忌语与詈词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虽然二者在内容范围上有不少重叠。

与詈语相近的言语行为尚有许多,如诟、卷、诋、谤、訾、啐、谩、让、诮、譊、呵(诃)、喝、斥、诘,以及复合词讥讽、诽谤、呵斥、诋诟、诘诮、漫骂等,均同中有异,容易理解,似不必细辨。^①

二、汉语詈词研究概况

汉语詈词是语文生活的重要现象,历史久远,现象丰富,是“国粹”之一,也

① 按,《汉语大词典》中由以上单音词组成的与詈语相关及相近的复合词条目十分丰富,有:谤詈、谤骂、诋詈、诋骂、卷骂、诅骂、诅让、诅咒、呵诟、呵骂、诃诋、诃毁、诃诟、诃詈、诃骂、訾呵、喝骂、吼骂、叫骂、譊诃、嘲诟、嘲詈、嘲骂、疑诟、讥骂、奚诟、斥骂、斥责、斥叱、訾叱、刺詈、责诟、责詈、责骂、谪骂、讪詈、讪骂、忿詈、恚骂、恚訾、恼骂、怨詈、痛诋、痛骂、啐骂、瞧骂、淬诟、淬骂、淬辱、淬语、吐骂、唾骂、喧诟、喧骂、嚷骂、漫骂、漫骂、慢骂、海骂、极骂、肆詈、浪骂、丑诋、丑詈、凌诟、疵诟、威诟、臭骂、吵骂、秽骂、辱诟、辱詈、辱骂、侮骂、毁骂、煎骂、毒詈、毒骂、恶骂、诟斥、诟叱、诟毁、诟讥、诟诘、诟斫、诟詈、诟漫、诟怒、诟让、诟数、诟淬、诟侮、诟诮、诟噪、诟訾、诟诅、诋叱、诋斥、诋诟、诋漫、诋诮、诋呵、诋诃、詈诟、詈诘、訾骂、詈辱、詈侮、詈责、詈訾、骂嚷、骂说、骂嗔、骂诃、骂喝、骂诅、骂讥、骂辱、骂侮、骂毁、骂言、骂伐,等等。罗列于此,以供参考。

是汉语研究不能忽略的内容。

汉语詈词的个别考释古已有之,如[明]方以智《通雅》中有散论,[清]赵翼《陔餘丛考·杂种畜生王八》有专论。现代学者的论述更不少见,著名的如鲁迅《坟·论“他妈的!”》、梁实秋《骂人的艺术》等。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詈词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20世纪90年代后,语言学界对汉语詈词颇多关注,研究渐成气候,力作如李荣先生的《禁忌字举例》(1994)开一时之风气。至世纪之交,汉语詈词的研究呈现一个高潮,出现了一批论著。研究成果形式有五,一为通论性语言学著作中有章节从委婉语、避讳语等角度涉及汉语詈词研究,如姚亚平《文化的撞击——语言交往》(1990)、曲彦斌《民俗语言学》(1989)、卫志强《当代跨学科语言学》(1992)、陈原《社会语言学》(1997);二为专门研究詈词的学术论文,数量有数十篇之多,详见参考文献,此处恕不一一列举;三为专书,有文孟君《骂詈词》(1998)、李炳泽《咒与骂》(1997);四为词典,有余云华《丑语大观》(1990);五为报刊网络杂谈类文章,数目繁多,质量参差。从研究内容看,涉及詈词个别考释、专书考释、分类考释、断代考释、语法学考释、语用学考释、文化学考释、民俗学考释、方言学考释、社会学考释等诸多方面。详细情况可通过本书所列参考文献深入了解。

三、本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汉语詈词是汉语词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语詈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汉语词义研究、训诂学研究、修辞学研究、辞典编撰等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纯洁和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从而提高全民语文素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汉语詈词研究的成果可以运用于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领域,对相关学科具有借鉴意义;对于语言教学和语文教学有指导作用。

汉语詈词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颇具深度和广度,但仍有不少领域需要进一步探索。从纵的方面说,汉语詈词的历史全貌至今没有人作出概述;从横的方面说,汉语詈词的语言、社会、文化的多角度全面考察有待加强;从广的方面说,汉语詈词的数目、分布、使用等还须彻底考察;从深的方面说,目前已有的成果对汉语詈词的研究尚未达到精深细致。

虽然汉语詈词的可研究课题很多,但一方面因为笔者学力有限,另一方面因为史籍浩繁造成詈词检索工作的艰巨,所以本书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汉语詈词

进行初步探讨。首先,本书试图勾勒汉语詈词的历史脉络,以断代的形式介绍汉语詈词的演变情况。限于时间和精力,本书对汉语詈词发展线条的描写十分粗略,只能大致说明某一时期出现了哪些詈词,对其中少数詈词的来龙去脉可能有些新见,然而恕不能详细考察每一詈词的渊源流变,对前贤论著中已经考察清楚的詈词亦不再重复征引以免繁琐。其次,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本书尝试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若干汉语詈词进行深入分析,重点从禽兽类詈词看汉语詈词体现的人性论,从性别类詈词探讨汉语詈词表现出来的女性歧视。虽然笔者觉得在个别问题上确实有所发明,但是一孔之见未必成立,敬请同仁赐正。如果能够在以上两个方面略有贡献,那么本书还是有一点价值的。

作为一部描述时间跨度很长的汉语詈词专题史,本书在语料选择方面无疑面临着较大挑战。本书的语料检索方法如下:先秦、秦汉时期,穷尽性地人工检索了这两个时期绝大部分传世文献;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献进行了人工检索;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先是从已有研究论著、相关词典中将该时期的詈词汇总分类,再手工检索了上百种口语体书籍中的詈词加以补充,然后进行分类考察;明清时期,考虑到文献浩繁带来检索上的困难,并且汉语詈词的整体面貌已在宋元以后基本定型,所以采取专书考察的形式,以明代的《金瓶梅》和清代的《红楼梦》两部文学名著为例观照这一时期的詈词面貌,虽然也查阅了众多该时期的文献资料并收集了不少詈词语料,但最终并未在本书中罗列出来,仅对该时期特别突出的詈词现象加以补充说明。另外,笔者对《汉语大词典》(12卷版)《汉语方言大词典》(5卷版)《唐五代语言词典》《宋元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元语言词典》等辞书作全程人工检索,引用了其中的詈词条目。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反复利用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电子文献》网上数据库,尤其是其中的二十五史和十三经注疏,检索了许多相关詈词数据。

本书按詈词的出现时间,将古代汉语詈词分为先秦、秦汉、三国至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时期进行分期考察,每一时期按内容将詈词分类归纳,字面上不易理解的詈词进行语源分析与词义训释。但是,不少詈词从字面本身就非常容易理解,因此对詈词的语义考察往往相对简略,更多的则是从文化的角度将詈词置于较为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进行考察说明,时有文化阐释多于语义考辨的现象。对具体詈词,笔者对自己确有所心得、有所新见的那部分詈词着墨较多,而对前贤已考释清楚的不少詈词,往往不再详细引述。本书除了考察詈词外,还涉及了骂詈行为等的研究。从写作的角度而言,本书在结构上有不足之处,第六章对明清詈词的介绍没有逐条考释,与前此各章体例不一。这

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明清时期新出现的詈词并不多,字面上亦容易理解,似不必逐条考释;二是分析专书詈词的用法,可起到以一斑见全豹的作用,通过专书詈词用法描述对汉语詈词整体上的用法有一个大致了解,以补本书不辟专章进行詈词的语言学分析之不足。以上种种欠缺之处,有待日后补正。

目 录

引 言	1
一 骂詈与詈词	1
二 汉语詈词研究概况	3
三 本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4
 第一章 先秦:詈词的滥觞	1
一 禽兽类詈词的思想伦理背景	2
二 身份类詈词的社会历史根源	5
三 种族类詈词的民族分化渊源	6
四 结语	8
 第二章 秦汉:詈词的发展	9
一 身份类词与对位贱者的贬斥	10
二 禽兽类詈词与人兽之分的继续强调	14
三 性别类詈词与对女性的歧视轻辱	19
四 结语	22
 第三章 三国至南北朝:詈词的丰富	25
一 骂詈之普遍与形式之多样	25
二 詈词之丰富与类别之众多	30
三 结语	46

第四章 隋唐:詈词的繁衍	49
一 骂詈之个例与方式方法之增多	49
二 詈词种类之增多与系统化	52
三 结语	66
第五章 宋元:詈词的转型	68
一 宋元詈词的转型	68
二 宋元詈词的主要类别	71
三 宋元詈词特点及原因简析	109
第六章 明清:詈词的泛滥	112
一 明清詈词分类介绍——以《金瓶梅》为例	112
二 明清詈词用法描述——以《红楼梦》为例	122
三 明清詈词补议	136
第七章 汉语詈词文化意蕴例析	144
一 从人兽之辨看汉语詈词体现的人性论	144
二 从男女之别看汉语詈词反映的女性歧视	148
主要征引文献	159
主要参考文献	166
后 记	175

先秦：詈词的滥觞

先秦詈词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出先秦时期不为圣贤便成禽兽的价值观念。其生成根源在于定贵贱之分,明华夷之别,辨人兽之异,其发展归宿在于人兽之辨。先秦时期讲求仁义礼智的道德教化是辨明人兽之异的重要标准。

汉语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之一,也是最富有表达力的语言之一。汉语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先秦诸子对语言已有比较丰富而又十分精辟的研究,老庄无名论、孔子正名论、墨辩、荀子约定俗成说等给后世留下宝贵的财富。先秦诸子对语言美亦有不少看法,如《荀子·非相》曰:“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喜欢美言善辞乃人之常情,但是,恶言粗语虽令人不堪忍受,却也自古有之,先秦文献中的骂詈词语已相当丰富。

先秦骂詈词语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类:一、骂人之卑贱如仆役,如《左传·文公元年》江平骂商臣“役夫”。二、骂人之野蛮如夷狄,如《诗·小雅·采芣》之“蠢尔蛮荆”;《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骂许行“南蛮鴟舌之人”。三、骂人之凶残如禽兽,如《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骂吴国为“封豕长蛇”;《孟子·离娄上》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四、咒人早死,如《诗·鄘风·相鼠》“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使人言于蹇叔“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五、咒人无后,如《国语·晋语》郭偃称“罹天之祸,无后”;《孟子·梁惠王上》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以上前三类分别定贵贱之分,明华夷之别,辨人兽之异,三者的共同归宿,在人兽之辨。后两类则是人兽之辨的延伸,“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无礼即禽兽(《孟子·公孙丑上》),既成禽兽,不如早死;咒死不足,“无后”应情而生。

一、禽兽类詈词的思想伦理背景

以禽兽骂人,最初只是个别的比喻性用法。这种比喻着眼于被骂者的行为或品格与某种动物劣性的相似之处,先秦文献中通常用以骂人的禽兽有鼠、蝇、熊虎豺狼、封豕长蛇等。

以鼠喻人,先秦文献多处出现。《诗·邶风·相鼠》以鼠喻人之无礼义廉耻之心。《魏风·硕鼠》以硕鼠喻统治者之贪而畏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齐侯对臧孙云:“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而何?”以鼠喻臧孙之贪婪而胆小。

以蝇喻人,似仅见于《诗经》。《诗·小雅·青蝇》以蝇之嗡嗡乱舞,喻小人之极尽谗言,搬弄是非,颠倒黑白。

先秦文献常见以熊虎豺狼喻人。《左传·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称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又宣公四年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又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谓伯石“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又哀公六年齐陈乞诬国夏、高张“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以上皆以喻被骂者的凶残狠毒。

封豕长蛇也较多用来喻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述封伯“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杜预注:“封,大也。”孔颖达疏:“《定(公)四年·传》‘封豕’与‘长蛇’相对,知封为大也。”“封豕”即大猪)又《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谓“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杜预注:“荐,数也。言吴贪害如蛇豕。”)《国语·周语中》:“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皆以大猪、长蛇喻贪婪无度。《左传·定公十四年》卫夫人南子与宋朝淫,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豮”,则是以猪喻淫荡无度。

以上这类比喻的使用,基于人们对某些动物劣性的认识,如老鼠贪而畏人,虎狼凶残狠毒,封豕贪淫无度。这种认识往往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表现出浓厚的民族心理特点。例如猪在中国一直被视为贪、淫的蠢物(先秦典籍中似更侧重其淫的一面,常以艾豮、寄豮、娄猪等喻淫乱者),后世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食肠如壑,色胆如天”的猪八戒,但其他民族对猪就可能没有这种认识。有时候骂人者的主观色彩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子文和叔向母,二人均以豺狼骂刚出世的孩子。当这种比喻性的骂法经常使用时,就会使某些动物名称获得一种固定的贬义,例如,一提老鼠,人们就会联想到贪而畏人,而“狼子野心”等已成谚

语(“狼子野心”一词《左传》两见,分别见于宣公四年、昭公二十八年)。语言中比喻义的形成,就是喻体经常代替本体使用,喻体最终获得本体的意义。

这类骂人语言,借助某种动物的劣性抒发骂人者的憎恶之情和贬辱之意,是针对被骂者道德人格上的某一方面的缺点而发的,但这并没有上升到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与动物性之分。例如上引齐侯以鼠喻臧孙,与《战国策·齐策》中冯谖以狡兔喻孟尝君智谋深远,手法完全相同,只是前者附以憎恶之情,后者加之赞赏之意罢了。姑且不论后世有骂“兔崽子”的用法,就鼠、兔而言,它们原本都是禽兽,却获得完全不同的褒贬色彩,主观的民族心理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这种骂法是个别的、零星的。

进一步的发展,是不说出具体的种类,笼统地斥为禽兽或“非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州绰在齐庄公面前骂殖绰、郭最:“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又二十八年卢蒲嫪骂子雅、子尾:“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宣公二年:“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国语·楚语》斗怀曰:“平王杀吾父,在国则君,在外则仇也。见仇弗杀,非人也。”均以禽兽或非人骂人品格之恶劣,或道德之低下,或人伦之败坏,是人兽之辨的开端。以下一条则从纯理性的高度论述人兽的区分,没有了骂人的语气色彩:《国语·楚语》记楚大夫申叔时之言:“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以“教备而不从”作为非人的标准,提出了人兽之界限在于教化人伦之道。这是人兽之辨最早的明确申述。

孟子提出了人兽间严格的区分标准。《孟子》以禽兽骂人共出现了两次:《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离娄上》:“嫂溺不援,是豺狼也”。那么,孟子区分人兽的标准是什么呢?曰:仁义礼智。《公孙丑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鲜明地宣布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为非人。《告子上》又一次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人皆有,没有便是非人,便成禽兽。

孟子以仁义礼智划分出来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而是理想的君子大人,因为只有君子大人们才符合其标准。孟子曰:“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其所谓的“人”,就是这样的君子,也就是与“立德保民”的大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以及孔子

的仁人君子一脉相承的理想人物。孟子的突出之处还在于他比前人更明确地将不合于仁义礼智标准的人们全都看成了禽兽。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公孙丑上》）公开将庶民仆役纳入了禽兽之列，从而使“不为圣贤，便成禽兽”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显扬和光大。

孟子也有与申叔时所论“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相类似的论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意在从教化、人伦的角度论述人兽之异，但最终的结论仍然是：“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合乎人伦之道。而圣人是没有的，孔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比圣人稍次一点的君子也是不多的。除此以外的大多数人自然只能与禽兽同列了。

荀子也重人兽之别，其判别的主要标准在一个“礼”字。“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其所谓礼，也就是人伦之常，就是亲亲尊尊之道，“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荀子·荣辱》）从根本上看，其标准与孟子是一致的。荀子没有将庶民仆役纳入禽兽之中，但仍明显地表现出把他们视为君子之异类的倾向。“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荀子·致士》）“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恇恇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恇恇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由鱼鳖而禽兽、百姓、君子；由狗彘而贾盗、小人、士君子，只有君子才合于礼义之道，余皆无礼义可言，所以，他的君子仍卓然独立于小人百姓、狗彘禽兽之上。

由个别的以某动物骂人，到笼统的斥人为禽兽或非人，到以人伦标准划定人兽之界，到以仁义礼智区分人与禽兽，思想线索是一贯的。随着对“人”的认识的日益具体化、明确化、理性化、理想化，禽兽的概念也随之清晰起来。“人”的含义始终不是自然界高级动物的人，而是合于某种价值标准的理想人格；人不是现实存在的芸芸众生的任何个体，而是一个模范的、品格完善的、应然的理想影子。从而，与之对应的“禽兽”，就是堕落的、卑劣的、无礼义廉耻的一类，包括自然界的动物以及行为思想与之接近的人们，主要是庶人仆役。由此我们可

以推断,先秦之以禽兽骂人,乃在于怒斥被骂者思想行为的败坏,或道德品格的低劣、人伦的丧失。其基本的落脚点在人伦之道,其典型的概括如孟子的仁义礼智,其集中的焦点在于荀子的礼。

二、身份类詈词的社会历史根源

何以庶民百姓、小人贱役会被如此看低?会被视为禽兽?这里面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史中,奴隶们实际上就是被作为禽兽看待和处理的。丰富的甲骨文金文材料表明,奴隶常与牲畜一起被任意杀戮,作祭祀或殉葬之用。据胡厚宣(1974)统计,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的270多年间“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人”(按,武丁时期商朝总人口仅为约五百万)。从被杀的奴隶与牲畜在数量上的比例看,有时人被看得连牲畜都不如。

奴隶又常与牲畜、器物一起被作为赠礼或赐品,奴隶之被视为牲畜物品是极自然、正常的现象。如《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妾是女奴。《说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左传·僖公十七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将盗窃马牛与诱偷奴婢视为同罪,可知臣妾(奴隶)的地位与马牛并无二致。

随着奴隶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显得日益重要,屠杀奴隶之风虽有大减,但奴隶并没有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直至春秋时期,买卖、赠送奴隶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著名的如百里奚,先被作随嫁品处理,后被秦穆公按当时市价以五张黑牡羊皮买回。百里奚曾任虞国大夫,沦为奴隶后尚有如此遭遇,一般奴隶的命运可想而知。在数千年奴隶社会史中,奴隶们被牲畜般地屠戮、赠送、买卖、使役,以至于大人君子们的观念中,他们真的变成了牲畜一般,因而《易》有“畜臣妾”之说(《遯》卦九三“畜臣妾,吉”),《尚书》有“天牧”之述(《吕刑》篇“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左传》有“天生民而立君,使司牧之”之论(襄公十四年),《管子》有《牧民》之篇,《孟子》有“人牧”之言(《梁惠王上》“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便成了“天下之通义”(《孟子·滕文公上》)。奴隶由地位的低贱而获得道德人格的卑下,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

我们因此可以深刻地理解骂人“役夫”的意义。《左传·文公元年》记楚成王欲废太子商臣而立王子职,商臣享江芊(成王妹)而不敬,江芊骂道:“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役夫”是服劳役或兵役的奴隶,本应就社会地

位而言,但江𦍋用以骂位贵为太子的商臣,则是纯粹就其道德品格而言了。享而不敬为非礼之举,不直接斥之无礼而代以骂之“役夫”,“役夫”成为了无礼的代名词。按孟子,役夫在禽兽之列;按荀子,役夫与禽兽仅存一步之遥。奴隶由禽兽般的生活而获得禽兽般的品格,便是“役夫”一词所体现的深刻内涵。

三、种族类詈词的民族分化渊源

蛮夷戎狄相对于华夏族而言。

华夏民族,自传说中的炎黄时代起,历经夏商周,在频繁的部族争斗中交流融合,发展壮大,至春秋末期基本定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夏族始终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领先于周边部族。华夏族虽然很早就产生了一种优越自觉,但对蛮夷戎狄的公开蔑视和贬斥则是较后起的事情。

史学研究表明,夏王朝有苗蛮血缘(董楚平列举 11 条证据,力证“夏王朝有苗蛮血缘当无可疑”);(董楚平,1998)商的祖先,据传是东夷的一支;周的始祖曾甯于戎狄数百年之久。《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鸱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夏商周三代最初既与周边四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不可能有蔑视或鄙薄之举。三代之际,部落间的征伐连绵不断,禹就曾征有苗、合诸侯、图成九州;成汤之时号称诸侯三千,至周初仅略存千八百,可见兼并之盛。但甲骨文中,“戎”是武器,“狄”是人名,“夷”是方国,均无贬义,“蛮”字尚未出现,可见直到商之时还没有蛮夷戎狄与华夏的对立。

华夏族自称诸夏、诸华,华夏是周以后的事,从此显露出尊华鄙夷的端倪,但发展为骂詈之语,仍有一个过程。武王克商,使用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的力量(事见《尚书·牧誓》),其时华夷杂居,断不会蔑视邻邦。周王朝建立以后,分封建,划井田,制礼作乐,国势日强,最终巍然立于中原之地。鹤立鸡群,环顾周边族,难免有优越意识,但也并没有自大到辱骂边族的地步,初时称蛮、夷、戎、狄也并无贬斥之意。《尚书》中之“蛮夷”“有苗”“莱夷”“淮夷”“岛夷”“和夷”“西戎”“淮夷徐戎”等,名称本身均不带有贬辱色彩;《舜典》中所谓“蛮夷猾夏”之“猾”也仅是“乱也”(《尚书》孔传)。昭王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遭陷于楚蛮;穆王远征西戎,自是“荒服者不至”(《国语·周语上》),“戎狄不贡”(《后汉书·西羌传》);懿王时“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汉书·匈奴传》);厉王时“戎锹寇掠”(《后汉书·西羌传》);直至幽王,镐京被陷,“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